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

——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刘中民¹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摘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世界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第一, 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 海权建设是以资本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性过程,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二, 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制约, 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陆海统筹和平衡能力, 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发展道路。第三, 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建设必须选择合适的限度和区域, 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有限性、区域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四, 新兴海权的成败取决于新兴海权国家如何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 中国应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 走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海权; 大国兴衰; 经验教训; 海洋强国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8049(2013) 08 - 0074 - 10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建设海洋强国”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即“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①进而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 围绕中国海权发展动向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际社会产生了激烈的争议, “中国海权威胁论”大有甚嚣尘上之势。以美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中美海上

冲突论”, 断言海上冲突将成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重要形式。^②进入新世纪以来, 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e)先是提出“中美陆权—海权平衡论”, 暗示作为传统陆权国家的中国只有不去挑战美国海权, 东亚才能维持一种奇妙的“和平地理学”。^③2009年他又提出“中国海军民族主义论”, 断言以“发展航母”、“扩充海军”为手段, 以“洗刷近代耻辱”、“收复失地”、“突破岛链封锁”为目标的“中国海军民族

收稿日期: 2013-05-09; 修订日期: 2013-07-01。

作者简介: 刘中民(1968—)男, 河北唐山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

① 胡锦涛著《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40页。

②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 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 第48页; James E. Auer, Robyn Lim, “The Maritime Basis of American Security in East Asia”, *Naval War College*, Winter 2001, Vol. 54, No. 1, pp. 39 - 47.

③ [美]陆伯斌“和平地理学: 21世纪的东亚”,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 第69 - 73页。

主义”,将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紧张关系”。^①近年来,西方学界和媒体还不断炒作中国的海上“珍珠链战略”,渲染中国正在实行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洋扩张战略。^②在国内,有的学者从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需要出发,疾呼中国需要发展海权,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③有的学者则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主张要避免进入“海权的误区”^④。

国内外之所以围绕中国海权发展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观点,从国际方面看,体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如何判断中国海权发展及其影响的战略困惑;从国内方面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中所出现的战略迷茫。因此,科学规划和安排海权发展战略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追求海权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有的国家通过发展海权实现了国家长久的强盛(英、美);有的国家则惨遭失败乃至国运衰落(法、德);有的国家的海权保持了长久的存在(英、美),有的国家则很快完成了从崛起到衰落的蜕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有的国家的海权追求一方面促进了国家崛起,但过度追求又成为国家衰落的根源(如俄—苏)。因此,科学总结和借鉴历史上海洋强国兴衰的经验教训,无疑有助于中国实现海洋强国的建设目标。本文从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支撑要素、海权发展的地缘政治制约、海权发展的限度、新兴海权与传统海洋霸权的关系四个方面,分析世界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记取历史经验:建设综合性 海洋强国

海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机遇始于中

世纪晚期的地理大发现,不同国家面对海洋的不同选择,尤其是东西方国家对历史机遇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欧洲国家抓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国家崛起,而东方国家尤其是创造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奇迹的中国,却与近代世界权势变革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一连串发问深刻地说明了明代中国与西方对海洋的不同认识和选择“明朝的这些远航(指郑和下西洋),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生产商业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命令便会完全、无可挽回地停止。”^⑤

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更新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考察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发展的历史线路是: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商业资本扩张(荷兰)——工业资本扩张(英国、美国)。其中,殖民地、海军构成了其重要的支撑,但最根本的历史动力及其支撑因素无疑是资本扩张的能力。世界历史还表明,技术与制度创新能力、产业主导能力也是决定海权盛衰的重要支撑性要素。在历史上,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技术革新,如葡萄牙的多桅帆船、荷兰的墨卡托航海图、英国的战列舰、美国的海军航空学等。世界霸权国不仅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

^①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 46–81.

^②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

^③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④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⑤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家,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①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2002年发表《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一文,对过去500年的世界霸权国家实力资源的演变进行了归纳(见表1),国内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主要海权国家崛起模式进行了概括(见表2),从中都可以发现海权构成了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表1 主要国家及其实力资源(1500—2000年)^②

时期	主要国家	资源
16世纪	西班牙	黄金、殖民地、雇佣军、王朝纽带
17世纪	荷兰	贸易、资本市场、海军
18世纪	法国	人口、农业、公共管理、军队、文化(软实力)、工业、政治凝聚力、金融和信贷
19世纪	英国	海军、自由准则(软实力)、岛屿位置(易于防守)、经济规模、科技领先地位、地理位置
20世纪	美国	军事力量和盟国、普及的文化和自由的国际机制(软实力)
21世纪	美国	技术领先地位、军事和经济规模、较实力、跨国通信的中心

表2 世界主要大国崛起的模式^③

国家	崛起模式
西班牙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
荷兰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
英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
美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海洋秩序)+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软实力

由此可见,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因此,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必须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避免将海权等同于海军,尤其要摆脱那种强调大国崛起离不开海权支撑,而忽视海权背后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简单化思维。

现代意义的海权概念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的海洋综合国力,是衡量国家海洋实力和能力的

重要指标,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应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战略层面:从国际方面看,中国海洋战略应以捍卫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维护和捍卫中国海洋权益,创造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全面参与国际海洋制度和海洋秩序的建设为根本目标;从国内方面看,中国海洋战略应以全面提升全民族海洋战略意识,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使海洋事业的发展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根本目标。^④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应该是包括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管理、海洋法律、海洋科技、海洋安全和海洋社会(文化)等战略,并彼此相互联系的系统战略体系。海洋经济战略的功能在于通过海洋开发与利用,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海洋政治战略的功能在于处理国际关系领域的海洋矛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并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海洋管理战略的功能在于借助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手段,实现对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中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海洋法律战略的功能在于海洋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服务于国际和国内海洋秩序的建立与完善;海洋科技发展战略的功能在于寻求海洋发展的科学技术支撑,并促进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海洋安全战略的功能在于应对海洋领域的传统军事安全以及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海洋社会(文化)战略的功能在于继承和借鉴人类历史上海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第9页。

^② [美]约瑟夫·奈“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载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③ 根据辛向阳“霸权崛起与挑战国家范式分析”一文的内容整理而成,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

^④ 刘中民著《世界海洋政治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3、14页。

洋社会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建构人类与海洋互动关系的良性模式,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海洋战略的各部分之间应该是相互融通、渗透与互补的关系,并服务于海洋发展大战略目标的实现。^①

二、尊重现实条件:走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发展道路

从海权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来看,相对于纯粹的海洋国家,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影响和制约,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陆海统筹和平衡能力。因此,中国的海权发展要科学统筹海陆两个发展方向,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也必须走陆海平衡的复合型海权发展道路。

客观地讲,海权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相关的地理环境因素是否有利于海权的发展。就海权发展战略而言,地理因素对于海权发展的影响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于地理因素利弊的战略处理和安排。这一问题对于英美等海洋国家相对容易,而对于兼具海洋与大陆属性的陆海复合国家如法国、德国、中国等则十分困难,其原因就在于陆海复合国家的国家战略始终深受其地缘环境双重属性的制约。我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先生认为,陆海复合国家面临的难题为:^②

第一,陆海复合国家通常面临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法国和西班牙作为显赫一时的强国都有过海陆两个方向的发展机遇,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来自海洋和陆地的双重诱惑,受到双重诱惑的法国和西班牙都曾试图采取二者兼顾的路线,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做双料强国,因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难以同时成功地支持两个方向的努力,战略集中是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

第二,两线发展易受伤害性。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海上和陆上都

容易受到攻击。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与英法两国轮流开战,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强国在霸权战争中也不时手忙脚乱地在海陆两个方向同时应付,经常为此陷入被动、尴尬的局面。对于小国或走向衰落的国家来说,两线发展易受伤害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克服这一弱点,既需要运气,也需要极高的外交技巧和谋略。

第三,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陆海复合国家无论是面临战略选择的两难,还是受到两线发展易受伤害性的困扰,归结底反映了一个资源分配分散化的问题。出于国家防御的基本需要,它们必须努力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有限的资源因此被分散使用。总的来看,陆海复合国家在成为两栖强国方面只取得了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功,资源的不集中妨碍了它们在任何一个发展方向上取得成绩。

第四,陆海复合这一地缘政治特征对一国的战略决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海权或陆权国家而言,地缘政治特征的单一性带来了决策的简易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而陆海复合国家由于存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故需要高超的决策者选定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发展道路。所以,决策者是否拥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讲,陆海复合国家的兴衰常常受到较强的个人因素的影响。

在历史上,陆海复合国家地缘战略选择面临的困难突出表现为:

第一,如何处理陆海兼顾与平衡。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德国都因未能有效处理这一问题,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第二,如何做到陆海兼顾中有重点。濒海强国在陆海兼顾时,一般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在兼顾的同时,注意根据威胁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或侧重陆地方向,或侧重海洋方向。但是,在现实中如何把握时机和幅度需要高超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战略”,《中国海洋报》2005年7月5日。

^② 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的战略智慧。

第三 如何防止海陆强国联合包围。历史上所有的濒海强国都是被海陆强国联盟打败的,因此濒海强国应把防止海陆强国结盟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第四 保持军队结构平衡。由于濒海强国的主要威胁时常摇摆于陆地海洋之间,因此在和平时期就要注意保持陆海军平衡,建立一支比例合理、结构均衡的军队。海军建设周期长、丧失容易恢复难,更应放在长远的历史时期内加以规划,循序渐进、逐步增强。^①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仍然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影响和制约,并容易在战略选择上出现偏差与错误,进而影响国家的安全乃至国际地位。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国家与近代中国的衰落均与未能有效处理海权与陆权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两线发展易受伤害性构成了中国固有的地缘政治弱点,决定了中国必须努力在海陆发展上保持平衡,并在国家大战略上选择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历史上,应对陆疆的压力始终是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历代王朝的防务重心,明朝中叶以来,中国才开始面对来自陆海的双重压力,并在清朝演变成日趋严重的“塞防”与“海防”危机并存局面。^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然深受陆海复合国家双重易受伤害性的困扰,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陆海方向的双重挤压,国家的安全环境极其恶劣。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我国北部陆疆的安全环境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目前,中国与南亚陆上周边国家虽然仍然有中印等边界问题,但总体态势是好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北和西南陆疆的安全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而也为中国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了较好的战略机遇

期。在陆上安全环境相对改善的同时,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现实与潜在威胁却不断上升。从捍卫领土完整的基本主权需求来看,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几个问题。因此,中国在继续经营陆缘战略的同时,对海上战略进行适当倾斜的必要性在不断加强。^③

但是,历史上陆海复合国家海权发展的教训表明,作为陆海复合国家的中国,其海权发展必须走陆海统筹的发展道路,平衡陆海两个发展方向始终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对的重大课题,同时也要求国家决策者拥有高超的战略统筹智慧。

三、俄苏兴衰的启示:中国应走有限性海权的发展道路

从海权发展限度的角度看,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海权发展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俄苏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中国既要通过发展海权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但又必须高度重视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走有限性、区域性海权的发展道路。

从16世纪开始,俄罗斯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长远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④

俄苏海权扩张的西线是西进波罗的海,进而进入大西洋,这是俄海洋战略最成功的部分,它直接促进了俄罗斯的崛起。西向扩张使其通过圣彼得堡的建立具有了海权国家的特性,避

^① 程广中“濒海强国参与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61-63页。

^② 刘中民著《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③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5年第1期。

^④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海权争霸与俄苏的兴衰及其历史反思”,《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6期。

免了在西欧海权崛起后从属于西方的命运,而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窃取更建立了其抵御西方的“缓冲地带”。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这甚至是当时俄国避免跌入第三世界的原因之一,“俄国在近代的初期并没有像东欧那样变成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其原因在于俄国的“领土一直在大规模地、不间断地扩张”,“扩展为从波罗的海伸向太平洋的欧亚大帝国”。^①

俄苏海权扩张的南线是南下印度洋。彼得大帝确立了俄南下地中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三条扩张路线,深刻影响了俄苏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由于受到英美等海权国家的遏制而屡遭挫折,除早年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争夺中在黑海有所收获外,后来在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阿富汗三线都遭遇沉重打击。

俄苏海权扩张的东线是东进太平洋战略。俄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而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入海口海参崴,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太平洋舰队,成为俄苏在远东地区施加影响的主要砝码。但是东向扩张先是在日俄战争中惨遭败绩,而后在与美国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同时其过分贪婪的欲望,尤其是谋求通过建立联合舰队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直接恶化了中苏关系。

从俄苏海权扩张取得的成果来看,三个方向的海权扩张,除南下目标没有实现外,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俄苏都打开了通向海洋的通道,从而使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缺陷得以改变,这也许是俄罗斯在近代以来的权势争夺中占据重要一席的原因之一。但是,过分的海权扩张对俄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和消极影响,甚至说埋下了走向衰落的历史隐患:

第一,受内陆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以及过于贪婪的海权扩张野心的制约,俄苏背上了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的沉重负担,力不从心、难堪重负。俄苏“在夺取‘六海三洋’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基本趋向是在黑海两海峡、波斯湾和东北亚洲轮番出击。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频繁转移,反映了它的霸权主义倾向

与力不从心的深刻矛盾和虚弱本质。”^②

第二,由于多方位的海权扩张,使得俄苏在战略上树敌太多而疲于应付,其经济与军事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难以支撑。在俄苏的海权扩张中,俄苏几乎在各个方向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英、法、德、日、美都曾经成为俄苏海权扩张的敌手,甚至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历史时期,俄罗斯要面对数个海陆强国的夹击。与此同时,土耳其、波斯(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中国等地区性国家更会因成为俄苏海权扩张的对象而与其发生矛盾或冲突,俄苏在其海权扩张的过程中几乎与上述所有国家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这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因此,虽然“俄国呼吸到了海洋的气息,但并不畅快,始终只是一个两只手发育极不平衡的巨人。在历次海战中,除了对相对弱小的瑞典海军、土耳其海军小有胜利,并与英国联手战胜过拿破仑的地中海的分舰队外,很难与英美海军,甚至德国、日本的海军争雄,并有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惨败的记录”。^③

第三,地处欧亚内陆的俄苏,在许多地区需要征服并跨越数个陆权国家和地区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海洋,导致其不断将异族纳入帝国版图,造成地缘政治结构的异常复杂。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④

俄苏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中国既要通过发展海权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但又必须高度重视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走有限性、区域性海权的发展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复杂地缘环境、国家实力的有限性,同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迟越等译《全球分裂》(上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9页。

②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③ 姚晓瑞“地缘环境对俄国海军发展的影响”,《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08页。

④ 龚洪烈“俄罗斯外交:历史与现实”,《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时更取决于中国外交战略和海洋战略的多重需求。

有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有三种基本需求,即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从长远讲,三种需求的满足是互利的,但在局部的时间和空间内又会产生重大矛盾,甚至在同一需求自身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矛盾。^①中国国家大战略要满足多重战略需求这一基本现实,要求中国海洋战略的构建要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多重战略需求,并有效弥合或减缓不同战略需求之间的矛盾张力,进而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实现。就主权需求与发展需求、责任需求的关系来说,中国既需要从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出发发展中国的海权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和海洋权益等主权利益,同时又面临着如何规避与周边国家的潜在海洋冲突,进而危及中国发展需求的满足,以及负责责任的地区和国际大国形象的塑造等问题的挑战。它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需求在于主权需求而非霸权需求,也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海权战略的构建不可能以全方位的远洋海权国家为目标,中国海权发展的性质也不会超出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捍卫海洋主权的需求。

因此,中国海权的有限发展绝不是以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为归宿和目的,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样性的安全压力决定了海权的有限性及其满足主权需求的性质,中国的综合国力根本无法建立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权力。^②

四、美国崛起的启示:中国应走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

从新兴海权与既有海洋霸权关系的角度看,新兴海权的成败取决于新兴海权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在历史上,德国因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惨遭失败,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而美国则妥善处理了与英国海洋霸权的关系,以有限战争达到了“权力转

移”的目的,实现了和平崛起。德国的教训和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应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走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

在历史上,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往往是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西方关于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首先,崛起国家有扩张的本性,“崛起国家”之所以会扮演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国家”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③其次,“崛起大国挑战现有霸权”造成国际体系的动荡。^④第三,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领导者的霸权导致全球战争,具有周期性的特点。^⑤第四,大陆霸权更容易因追求包括海权在内的世界霸权而扮演海洋霸权的挑战者角色。^⑥这里需要我们思考和质疑的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新兴的陆权国家是否更具有易于扮演既有海洋霸权挑战者角色的倾向。就历史来看,法国与英国的冲突、德国与英国的冲突、俄国与英国对亚洲的争夺乃至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固然具有陆权与海权对抗的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只有陆海复合国家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必然充当海洋霸权的挑战者,事实上近代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与葡萄牙、英国与荷兰之间对世界霸权的争夺,20世纪日本在东亚与英美的矛盾冲突都是在海权国家之间展开的。因此,尽管法、德、俄等陆海复合国家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与既有的海洋霸权发生了冲突,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只有陆权国家或陆海复合国家才

^① 王逸舟著《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23页。

^②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第13页。

^③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Edited by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44.

^④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4th ed., Alfred A. Knopf, 1967, pp. 36-3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orton & Company Ltd., 2001, pp. 18-19.

^⑤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⑥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

能充当挑战者的角色,海权国家同样可以充当霸权挑战者的角色。在世界霸权挑战者的角色问题上,并不存在陆权国家或陆海复合国家固定充当挑战者的历史铁律。^①

第二,新兴的海权国家是否具有和平崛起,进而避免与现存霸权冲突的可能。尽管德国对海权的追求确实酿成了世界性的冲突,但是美国海权的崛起在总体上并没有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总体的、循序渐进的外交战略完成的,基本上可以定位于和平崛起。因此,新兴国家的海权崛起并非只有暴力方式一种历史路径。德、美作为新兴国家在处理与传统海洋霸权关系上的不同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

在历史上,德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其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在于大陆,但德国选择盲目发展海权,背离了德国大陆性为主的地缘特征,海陆两个方向过多树敌而使陆海复合国家两线发展易受伤害性的弊端加剧,最终其挑战英国海洋霸权的战略选择遭到彻底失败。

但是,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其海权战略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美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直接挑战包括海权在内的英国世界霸权,而是将海权战略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结合起来,进而规避扮演世界霸权的挑战者角色,相对平静地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其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处理好与当时海权霸主英国的关系,充分利用机遇跳跃式发展。其次,借鉴历史上英国成功的经验,善于维持陆上均势,利用陆地强国间的矛盾保持陆上力量平衡。第三,在具体问题上采取武力与和平双重手段并用的策略,并在海权扩张战略上采取了选择英国霸权较弱的太平洋作为重点扩张区域。^②

美国海权的崛起过程尽管也是通过一系列扩张完成的,尽管也在局部与既有的海洋霸权英国发生过冲突,但是美国在总体上并没有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孤立主义”、“门

罗主义”、“威尔逊主义”等总体的、循序渐进的外交战略完成的,因此美国的崛起基本上可以定位于和平崛起。

因此,新兴国家的海权崛起并非只有暴力方式一种历史路径。除此以外,还必须考虑战前与战后、尤其是当下的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和时代主题的不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冲突构成了“二战”前国际体系的总体性、结构性特征,其内在矛盾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大国的世界性扩张政策,殖民地的征服和控制构成了霸权争夺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在此过程中海权力量具有超乎其他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但是,伴随战后以来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深化,尽管谋求地区性或全球性海权仍然是世界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权的战略重要性依旧存在,同时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它不再构成历史上大国矛盾的结构性因素(如在“一战”前后大国围绕海军力量比例分配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海权功能也在日趋多元化,海军的外交功能,尤其是其维护海洋通道安全、处理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功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一切都表明,新兴国家在当下的海权发展尽管有可能导致大国关系的紧张,但已经不再是导致大国冲突的结构性矛盾。

在中国海权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不因中美冲突而中断,始终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过加强中美的战略对话,澄清中美海权的不同性质。中美双方应通过战略沟通认识中美海权的不同性质,即美国海权是一种全球性、霸权主导性海权,而中国海权是一种区域性、有限性、主权性的海权,中国海权发展的性

^① 刘中民著《世界海洋政治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63页。

^②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第10-12页。

质不会超出一个陆海复合国家捍卫海洋主权的需求,进而使彼此能够认识到双方在海权领域的矛盾不会构成国际体系的结构矛盾。不容否认,当前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着来自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的危机与压力。近年来,中国的确有因东海问题、南海问题而加大、加快海权发展的必要性,并被美国视为挑战其亚太主导地位,进而有引发中美关系紧张乃至潜在冲突的可能性的存在。笔者认为,在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过程中,从中国方面而言不宜夸大和渲染中国海权与美国海权之间的矛盾,同时需要向美国表明中国的立场并力争获取美国的理解;美国方面则应该对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危机及其解决此类危机所需要的海权发展予以理解,进而使双方都能够在认识到彼此海权不同性质的基础上,在主观上规避双方的海权冲突。^①对此,美国尤其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国并非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更没有将美国驱逐出亚太地区的企图和力量;美国还应该认识到,如果美国要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及其同盟体系阻遏中国国家主权追求的实现,美国将冒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也应该认可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中国也没有力量挑战这种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发挥着平衡该地区局势、维护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的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规避或减少冲突。中美双方除了需要正确认识彼此的海权性质及其发展,并力求规避冲突,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领域建立和加强海洋安全磋商机制,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因对方军事活动发生误判而引发武装冲突或战争的危险。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美两国一直就建立和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进行对话,并达成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②由于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不愿看到因海上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甚至引起意外武装冲突,因此两国都不会放弃或者弱化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从长远的角度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内容也应该不断得以扩展,并包括海洋非传统安全等领域,进而形成中美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机制。

第三,谨慎有序地推动包括海空军力量在内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实现以实力求和平。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的同时,应根据需要适度推进海权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在处理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做出的理性的选择,但就目前而言这一原则没有得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有效配合,也没有找到具体的、适合的操作方案。相反,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则呈不断加剧的态势。毫无疑问,和平对话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权益争端的理性选择,但真正要使这一原则得到相关各方的配合,恰恰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如果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同时办事公道,入情入理,……谨慎小心地处理与有关国家的海界争端,中国就能够既保障应有的海洋权益,对潜在的麻烦起到有效的威慑和抑制作用,又给世界展现一种友好和平、善于睦邻和促进共同发展的正面形象。”^③

编辑 战海霞 王 华

^① 刘中民“海权问题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矛盾的认知与艰难的选择”,《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58页。

^② 关于该问题的详尽论述可参见钱春态“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初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

^③ 王逸舟著《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The Sea Power Strategy Choice of Constructing a Powerful Maritime Nation for China

——The Sea Power and the Experiences and Revelation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LIU Zhongmin¹

(1.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se and fall of sea power in the world from four aspects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marine power construction. Firstly,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sea power proves that the building of sea power is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culture, technology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and the innovation of capital and institution is the core of the building of sea power. As a result, China should choose a comprehensive way in developing sea power. Secondly, a land-sea country is constrained by its geopolitical shortcomings, and the key to victory of the sea power building is depending on its powerful land-sea balancing ability. China's maritime power construction should coordinate land and sea and take complex development under consideration. Thirdly, the sea power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sea country must ascertain the moderate scale and proper region. China should choose a limited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ay in developing the sea power. Finally, the emerging sea power must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with traditional sea hegemony. Meanwhile, China should arrange cautiously th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raditional sea hegemony, and should choose a peaceful road for sea pow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sea power;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powerful maritime nations